



Working Paper Series No.33  
Original Research Paper

September 2020

離散之後：眷村族群的身份認同與精神主體建構

尤柏勛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

[joseph.aa06g@g2.nctu.edu.tw](mailto:joseph.aa06g@g2.nctu.edu.tw)

## © 著作權聲明

本文著作權屬作者擁有。文章內容皆是作者個人觀點，並不代表本中心立場。除特別註明外，讀者可從本中心網頁下載工作論文，作個人使用，並引用其中的內容。

徵引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工作論文系列文章，需遵照以下格式：作者，〈文章題目〉，文化研究國際中心工作論文，ISSN 2707-2193，文章編號，文章所在網址。

## © Copyright Information

The authors hold the copyright of the working papers. The views expressed in the ICCS Working Paper Series are those of the authors and do not necessarily reflect those of th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 Users may download the papers from ICCS website for personal use and cite the content, unless otherwise specified.

Citation of the ICCS Working Paper Series should be made in the following manner: Author, "Title,"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 Working Paper, ISSN 2707-2193, No. #, URL of the publication.

國立交通大學文化研究國際中心

**International Center for Cultural Studie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Rm.103 HA Building 2, 1001 University Road

Hsinchu, Taiwan

Tel: +886-3-5712121 Ext.58274, 58272

Fax: +886-3-5734450

Website: [https://iccs.nctu.edu.tw/en/wps\\_list.php](https://iccs.nctu.edu.tw/en/wps_list.php)

Email: [iccs.wps@gmail.com](mailto:iccs.wps@gmail.com)

## 離散之後：眷村族群的身份認同與精神主體建構

尤柏勛

國立交通大學應用藝術研究所

### 摘要

「眷村」作為臺灣戰後獨特的社會現象，所發展的文化意涵不僅是城市紋理的，也是精神結構的。1949年國民政府因國共內戰失利撤退來臺，大批來自中國各省的軍隊及其眷屬被迫轉往臺灣，是民國以來最大宗的人口遷徙，亦形成了特殊的眷村聚落與地景。當政府將臨時性質的老舊眷舍拆除轉而將眷戶安置於國宅，對於外省族群而言，拆除的不只是物質性的身份象徵，同時也移除了眷村居民的生命場所，成為某種精神上的流亡。作為生長於臺南市北區實踐新村的「少數」眷省三代，本研究試圖透過此生命場所的自我民族誌（autoethnography）書寫，以自身成長的「眷村」作為起始點，訪查相關的眷村形成路徑圖，論述其地方感、歷史性，以及共同存有的精神結構。並以感官民族誌（sensory ethnography）作為藝術實踐的方法取徑，試圖回應與反思臺灣戰後眷村歷史脈絡中關於「離散」的提問。

**關鍵字：**眷村，外省族群，內部離散，國族認同，民族誌實踐

**After Diaspora:  
Constructing Identity and Subjectivity of The Ethnicity of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s**

Bo-Xun You

Institute of Applied Arts, National Chiao Tung University

[joseph.aa06g@g2.nctu.edu.tw](mailto:joseph.aa06g@g2.nctu.edu.tw)

**Abstract**

A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 is a unique social phenomenon found in Taiwan after WWII. It has developed cultural connotations that are not only urban texture but also a mental structure. Due to its defeat in the Chinese Civil War, the Kuomintang government retreated to Taiwan in 1949. A large number of military personnel and their families from various provinces of China were forced to come to Taiwan. This was the largest population migration since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established, and it also formed a special settlement of military dependents and landscape. When the government demolished the old buildings of dependents’ village and placed villagers in public housing, the demolition not only destroyed the material symbol of their identity, but also removed their living places, causing their emo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exile. As the third generation of a minority group who grew up in a dependent village, through artistic practice, I attempted to write my own autoethnography that has already disappeared in this place. Using the “dependents’ village” I grew up in as a starting point, I visited the related village map and discussed its sense of place, historicity and spiritual structure. Using sensory ethnography as a method of art praxis, I responded to and reflected upon the questions regarding “diaspora” in the history of the dependents’ village.

Keywords: military dependents’ village, mainlanders, internal diaspora, national identity, autoethnography

## 一、內部離散：眷村族群的精神流亡

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因國共內戰失利撤退來臺，大批來自中國各省的軍隊及其眷屬被迫轉往臺灣，是民國以來最大宗的人口遷徙，一開始，面對這麼大批的移民，政府尚未有安置的解決之道，因此許多人暫居於學校、寺廟中，或是接收日本人遺留之宿舍，甚至是棲息於牛棚、馬槽等艱困環境，直到後來才開始將空餘廠房分配給軍眷居住，政府以反攻大陸作為目標，急撥「急造眷舍專款」以供建造眷舍，將軍人及其眷屬以軍種、職業、特性等，分別群聚於一定範圍。為了解決居住問題，各級部隊也自籌經費建造房舍，做為居住處所，暫時居留的心態，房舍以「竹椽土瓦蓋頂、竹筋糊泥為壁」的簡陋形式建造，在這樣的時空背景下，形成了特殊的眷村聚落與地景。

當兩岸情勢稍緩以及國際情勢改變，當時的總統李登輝先生宣布終止動員戡亂時期，反攻大陸正式走入歷史，軍人們一生信奉的信念逐漸裂解，回鄉的渴望與反攻的願景使他們始終無法扎根，隨著第二代的出生，他們仍然無法將這片土地視為家鄉，而將光復祖國的希望寄託在第二代身上。對第二代而言，身分證上的省籍是他們想像中的、總有一天要回去的祖國，然而省籍情結卻讓他們在國族認同上產生矛盾，精神信念無處依託。民國七十六年開放兩岸探親，當眷村第一代回去朝思暮想的中國，非但景物人事皆非，更直接地面臨了一種矛盾的身分困境——被留在中國的親友視為臺灣同胞，回臺灣時卻是外省人。當初辭鄉踏上無法回頭的軍旅，回去後卻發現所謂的家鄉僅停留在過去的記憶中。眷一代的「二度辭鄉」，使他們再次踏上流浪之途。時間來到民國八十五年，政府頒訂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將臨時性質的老舊眷舍拆除，轉而安置於國宅，對於眷村族群而言，拆除的不只是物質象徵，更是帶來精神上的流亡。

### （一）回到實踐新村

民國九十年，當時實踐新村的改建工程已延宕多年，大部分的眷舍已拆除，僅剩零星散戶因某些原因而不願撤離，或有抱持著現在住的眷舍比國宅的坪數為大的心態，或是因為不符合配住國宅的資格等而拒絕搬遷。國宅的配住資格是由軍方依照軍種與職等來決定分配次序。當時的政策是，在賠償其地上建物之款項後，以優惠售價配售給原眷戶及有眷無舍的官兵居住，然而我的祖父約在民國四十七年為了結婚養家育子而於提前退伍，支領一次性退伍金後，便喪失了軍眷資格，無法配住國宅也無處遷居。在國軍老舊眷村改建條例訂定公布以來，就時常聽聞即將搬遷的消息，母親因擔心居無定所，在民國九十二年預先貸款購置了一戶法拍老公寓，「我們為什麼要搬家？」年約六歲的我心中抱著如此疑惑，卻不知道住在眷村的時日已所剩無幾。



圖 1.1 實踐新村局部舊照

民國九十四年，家門正對面的國宅工程已開工一段時間，鐵皮浪板隔離出一大塊施工區域，鷹架與鋼筋聳立著，水泥一袋袋地堆放於側，與老舊並擴建成奇形怪狀的眷舍對比之下，拼接的區塊形成奇特的異質空間。在某日放學回家，只見父親緊張且急促地收拾著家當，將日用品胡亂地裝箱，大型傢俱與貴重家電全部推到家門外，一趟又一趟的把屋內能拿的、能抓的通通先丟出門外，當下的我還沒意識是什麼情況，許多個人物品也來不及從屋子裡拯救出來的時候，一臺挖掘機便直直地砸向家屋的牆壁，看著祭祖祠堂、車庫、廚房，一個接一個塌毀，愣愣站立一旁目睹全程的父親，落下從未在他眼角見過的淚水，不到半天的時間，已認不得房子原本的模樣，只剩一片斷垣殘壁。面對這段記憶，我開始思考並對自己提問，出身於眷村背景如何影響形構自我認同與個人特質？這是否回應了拉岡（Jacques Lucan, 1901-1981）所提及的，如何在經驗「缺失」（absence）和「匱乏」（loss）的過程中產生主體性？眷村的拆除，除了使童年記憶的場域消失，對於上一輩而言，是否也使得他們的某種信仰依託崩毀？在思忖著個人經驗與眷村連結，亦是否如社會學者紀登斯（Anthony Giddens, 1938-）所言「反身性地安排自我敘事（self-narratives）而形成自我認同」之歷程，藉著敘事自我的故事、將自我的

生命歷程與記憶，和更大的歷史、社會、文化連繫起來（楊佳嫻，2013：26）因此，抱持著這樣的問題意識，啟動了從追尋自我到眷村後裔主體建構的藝術實踐。

## （二）祖國或母國：眷村作為社會建構的地方

我所居住的實踐新村，由陸軍總部興建並管理，在眷村建立初期，由於眷村的臨時性特質，如同全臺各地眷村以「竹椽土瓦蓋頂、竹筋糊泥為壁」的方式建造，時常需要補強，居住品質低落。到了民國六〇年代，眷村中興建了「敬老院」、「社區活動中心」，附近還有三所學校，分別為延平國中、成功國中以及大光國小（黃于禎，2011：105），生活機能逐漸完善，也開始出現文教機構等設施，顯示出眷村發展趨於穩定，換言之，眷村生活圈發展成型，眷村族群在此成家立業，是否也反指「反攻大陸」成為永遠無法達成的理想？

由於戰後法制不全，眷舍的配給除了由陸軍總部安排之外，亦出現許多投機者的非法占地行為，以至於民國七〇年代，當家中人丁逐漸興旺之際，祖母變賣原眷舍，意圖購置土地自建新房舍，卻意外購入非法土地，也正如此，在眷村改建之際，我們的房產遭以違章建築處理。實踐新村拆除後整建為大道新城。由於外省第二代、外省第三代（後簡稱省二代、省三代）開始，多數人將配住的國宅變賣而向外發展，因此國宅現今的居住人口以外移者居多。由於鄰近的九六新村於近年拆除完畢，正處於招租閒置狀態，再加上國宅周遭多為仁愛之家所出租之建物，無論商業或生活機能的發展皆趨於緩慢，即使位於學區以及鄰近交通核心臺南火車站，仍可觀察其發展不如其他行政區，淪為被邊緣化、被經過的場域。

這塊土地，在清代被刻意安排為練兵場，一直沿用到日治時期結束，隨著國民政府接收臺灣，在政治局勢下，又再次成為人為安排的眷村空間，逐漸發展出其獨特的意義與雙重物質性：一方面，政府賦予眷村政治作戰的臨時駐點的意義，另一方面士兵們則視為暫時居留的場域。從過去到現在，眷村一直是因應當時局勢而刻意安排、建造的場所。我們是否可以說，眷村就是由社會所建構而成、具有異質性的「地方」，在人造且封閉的眷村裡，這一群戰後裔族在此接受教育、在此成長生活，結構出某種「排他」的思考模式與意識形態。在這樣的精神場域中，眷二代們如何構築生命意義？離開眷村後，垂直性遷徙至國宅的眷村居民們又如何看待這個地方？而沒有居住在國宅的眷村居民，對於地方凝聚感的裂解，又該如何面對內部離散狀態下的情感錯置？

「離散」（*diaspora*）一詞，意味著因跨國而生的流離狀態。當一個人或一群人，自願或非自願地跨國移動——包括驅逐、逃難、人口販運、移居、移民等（殷寶寧，2017），使用「離散」一詞在於不把遷徙視為僅發生一次，只產生單向性結果的事件，而是把它視為在物質、文化，甚至政治層面上建立鏈結與關係，而持續行進的過程（Kalra 等，2008：24）。「省一代」因為戰爭而跟隨著國民政府軍隊來到臺灣的離散族群，當時「一

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口號喊得響亮，預想客居 (migrant) 於此，並不打算久留，殊不知卻成為他們永久落腳的地方。

隨著時間推移，省二代出生後，省一代反攻的理想逐漸夢碎，稀釋為對省二代收復國土的寄望延續。解嚴後，對於從未到過祖籍地的省二代而言，面對自民國七〇年代後本土意識逐漸崛起，壓迫了外省族群的話語權與生存空間之外，也逐漸影響他們深植心中的情結，在面對認同問題時甚至出現轉向。他們不知道何處為鄉，中國對於省二代而言，究竟是祖國還是母國？此種矛盾心理狀態與眷一代所灌輸的精神結構開始分裂，屬於眷二代自身的「內部離散」因此產生。當政府頒訂眷改條例，將依法規拆除老舊房舍，或是改建為國宅，當眷村族群還分不清原鄉、家鄉，心理狀態持續鬥爭之際，似乎是聲明將要拆毀他們的精神寄託，因此引發極大的反彈聲浪，許多眷戶不願自己的家屋被拆除遷移，「人、事物和實踐，往往與特殊地方有強烈的聯繫，當這種聯繫遭到破壞（當人們『不得其所』），他們就會被視為犯了『逾越』（*trasgression*）的罪行」（Cresswell, 2006: 42），身為切身經歷過眷村改建的省三代，對於如此的狀況能夠感同身受，即使不是最完美的居所，但是拆除掉曾創造許多回憶的居所就如同將生命的一部分給抹滅、拔除掉，身心無所安頓。

### （三）小結

眷村在政治與歷史局勢下成型，也在法規政令下消滅，然而眷村的消長並不只是物質性的存有與消失，在眷村空間中的政治結構、人口組成、意識形態、地方感與文化脈絡都值得仔細地去檢視與反思。眷村作為一個社會建構的地方，我們如何利用更具人文與地方關懷的眼光去看待？本土意識的興起與眷村的拆除也許打破了本省與外省的文化藩籬，然而，為何外省族群仍擺脫不了外來者的標籤？本文試圖釐清的是，究竟是什麼樣的心理狀態，才使得外省族群對自己的根源無法認定之外，對臺灣這片土地也始終無法認同？然而身為一位省三代，我如何看待眷村的物質消亡？眷一代、眷二代與我的意識結構又何異同？

## 二、身份認同：「眷村」作為主體

眷村作為戰後獨特的文化脈絡，在其歷史、文化與精神結構之下，無論是退守至臺灣的逃難經驗、集合空間的日常生活與集體記憶，或是外省族群對於自我認同的矛盾，其相關創作的論述與概念皆有同質化的取向，因此逐漸建構出其主體性，其背後隱含的議題是離散、國家認同與身份認同。此章節所討論「眷村作為主體」，嘗試思考外省族群在精神結構上是否有著相當程度的雷同，在精神與國族認同的層面上，始終無法認定自己是臺灣人，他們或許終其一生「寄居／寄生」於這片土地上。而這樣的精神樣貌，



不斷出現在臺灣許多以眷村作為主題的作品，從文學到影視作品領域，皆有創作者投入，其中，眷村文學、眷村電影的形式佔了多數。

眷村文學與影視在本研究的討論立場，比較像是以作家「自我民族誌」書寫的相關「文獻、作品探究」因此，本章節將針對以眷村作為主體的文學與影視作品作為討論範圍。

### （一）鄉關何處——認同焦慮的書寫

以眷村作為書寫題材的作家，其身份背景通常是出生於眷村，或是從小就來到臺灣定居生長，如朱天心、朱天文、張啟疆、蘇偉貞、袁瓊瓊……等，其作品多以描寫眷村的日常生活景況、眷村變遷下的時代殘影、懷念眷村生活的詠嘆等，部分作品也不乏透過省二代的角度去描寫省一代來臺後的遭遇。眷村文學作為一種特殊的文類，其本身的出現，便與眷村拆遷的危機有關。因作家們本身的生命經驗發生於眷村的緣故，在諸多方面體現了某種真實，身為眷三代，本論文關注於眷村文學中所刻畫的「內部離散」，無論是省一代自中國大陸來到臺灣無法融入社會的窘境、省二代所面臨的身份認同困境，我也關注居住過晚期眷村的居民面臨眷村拆除後所經歷的離散之感，我透過自身經驗出發，揀選了一些作品，試圖去檢驗與貼近我印象中所認識的眷村，據此作為後續藝術實踐所依循的脈絡。

「眷村子弟離開眷村，並不是開枝散葉，相反的，是匯入社會洪流中，就此無影無蹤。」（袁瓊瓊，2015：155）袁瓊瓊在〈滄桑備忘錄〉中說明了眷村後代不得不面臨的結局，「眷村的人全都失根，被截斷了移植到他鄉，某種程度的扭曲和變形幾乎是必然的。眷村子民的『無著落』感，可能要幾代才能消除。」（袁瓊瓊，2015：10-11）更加詮釋了眷村後代普遍面臨的心境，或許也反映了一直以來我執著於眷村記憶的原因，而在朱天心在〈想我的眷村兄弟們〉中提到「那一年，她搬離眷村，遷入都市邊緣尋常有一點點外省人、很多本省人、有各種職業的新興社區，河入大海似的頓時失卻了與原水族間的各種形式的辨識與聯繫。」（朱天心，1998：77）描繪了眷村族群逐漸融入臺灣社會，卻仍然有些格格不入的寫照。

眷村文學若視為一種民族誌，它的田野取材來自於現實中眷村生活的描寫，鉅細彌遺地表徵出許多不為人所知的故事，也體現出眷村後裔如何去思考國族認同的矛盾，以及感傷精神寄託場域的消亡。

### （二）從光影中看見離散

以戰後或眷村為背景的影視作品，自解嚴後開始出現，最早的是於一九八三年上映的《小畢的故事》與《搭錯車》，《小畢的故事》改編自朱天文的同名小說，講述一位眷村青少年的成長故事，透過鏡頭刻畫出臺灣早期眷村的生活樣貌；《搭錯車》則講述一位被退役老兵收養的女嬰，其成長後追逐歌唱夢想的故事，也反映出眷村中

基層居民的生活景況。在影視領域仍有許多優秀精彩的作品族繁不及備載，以上所提到的均是以眷村作為背景，描繪時代縮影，較具代表性的作品，然而本論文關注的是描繪出國家認同與身份認同的矛盾、無法安心落地扎根的懷鄉情懷，以及眷村改建政策下，基層的眷村居民淪為失依的犧牲者，因此揀選下列電影與紀錄片作為討論的核心。



圖 2.1 《香蕉天堂》劇照一

資料來源：《香蕉天堂》（取自：<https://myvideo.net.tw/details/0/171068>）

電影《香蕉天堂》講述了跟隨著國民軍隊漂流，定居於臺灣的外省人，在混亂的世代企求生存的故事，描繪了外省人在臺灣落地生根的過程。此片除了呈現了外省族群與原鄉分離的缺憾，也凸顯出他們在臺灣由於語言與身份的隔閡，難以融入與生存的處境。



圖 2.2 《我家住在康樂里》紀錄片畫面一

資料來源：《我家住在康樂里》（取自：<https://youtu.be/5OjujzcZ5Wk>）

紀錄片《我們家在康樂里》，記錄了康樂里社區的居民面臨眷改條例，在失去家園前奮力抵抗的過程。其居住者多半是隨國民政府來臺的退役軍人，不禁令人思考何以跟隨國民政府來到臺灣奉獻一生的退役軍人落得如此下場，讓他們踏上二度流亡，他們的信念與餘生如何安置？他們何辜成為政治鬥爭或政治協商下的犧牲者？眷村就像是這群老兵承載一生寄望的飄浮載體，政府又怎麼能夠像剷除毒瘤般將他們趕盡殺絕？社會正義要在怎麼樣的脈絡下得以實踐？

### （三）小結

眷村文學非常細緻地描繪人物性格與背景，其特殊性在於作家們所擁有的眷村居住經驗，他們既是敘事者，也身在被描述的文化脈絡中，他們的創作以一種近似民族誌或類報導文學的文類呈現，不只是以一個外部觀察者的身份描寫眷村族群的生活樣貌，而是以內部成員的身份，紀實地刻劃出真實生活於眷村的經驗，以及在眷村的環境成長下所形塑的意識形態與精神主體。影視作品作為一種映照時代縮影的透鏡，則以貼近現實的方式反映了真實世界的社會現象。關於眷村，我想聚焦以下四點：首先，外省族群活在想像中的祖國，無法真正融入臺灣社會，在精神上，無法真正成為臺灣人；其二，由掌權者所形塑出眷村的政治性壓迫空間，如何形構出眷村族群的離散感與意識形態；其三，透過回溯眷村改建的個案，闡明與檢討政策制度下無法落實的社會正義；最後，根據眷村居住經驗對自身所產生影響，透過藝術實踐重新詮釋這段過往。文學與影視作品

提供的不只是物質性的視覺符號，在經驗這些作品時，能經由抽離置換時空，感知並內化成一種經驗，角色性格的形塑與背景脈絡的堆疊，使我們與作品中的主角產生共感，透過爬梳眷村文學與相關影視作品的過程中，可以體悟到眷村族群所面臨的無可奈何，也許是面臨被迫離開家鄉而來到異鄉，多年後再次踏上故土，發現自己既不屬於中國也不來自臺灣，抑或是無法融入臺灣本土社會的窘迫困境，「身份」與「認同」之間存在著巨大的鴻溝。

### 三、眷村輪廓：從個體敘事到地方建構

民族誌 (ethnography) 是質性研究的方法之一，是一種利用實地田野考察提供人類社會的描述研究，其實踐方法為研究者直接且持續地接觸目標群體，並以他者的身分利用參與觀察、傾聽與提出問題的方式介入群體的日常生活，是一種奠基於民族誌學者的經驗而生產與詮釋有關社會、文化與個人知識的過程，旨在體現民族誌者的實際經驗，這些經驗都必須忠於生產知識的背景、協商過程與主體際性 (Pink, 2009: 8)，側重在人類群體文化的描寫，以文字或影像的方式呈現。

民族誌的研究方法與理論，在現代質性研究中受到相當的重視與採用，但質性研究者發現，若僅將研究重心放在探討個別群體的微觀層面，似乎是忽略了他們與外界文化的、制度與社會的關係 (張安捷, 2008: 6)，民族誌者必須重新思考自己的定位，是溝通傳播者而不是科學家，積極地參與社群互動而不僅是觀察，將田野調查視為與他者社群交流的一種形式，透過實踐方法，將民族誌從文本空間轉換為共同體驗的時間 (Conquergood, 1991: 183) 在二十世紀六〇年代的後現代思潮中，當研究學者們意識到民族誌的限制與重新定義，開始探尋不同的方式寫作民族誌，本論文基於兩種不同於傳統民族誌的研究取徑來探討眷村文化和精神結構與我本身的經歷和認同的關係，分別是自我民族誌與自我民族誌與感官民族誌。

#### (一) 從自我書寫到感官實踐

自我民族誌 (autoethnography) 與民族誌的差異在於研究對象的不同，民族誌的研究對象為自我以外的他者，自我民族誌的研究對象則是研究者本身。從字面意義上來看，包含了三種層面：「自我」(auto) 指涉的是個人經驗的、自傳的；「民族」(ethnos) 則是關於族群的、歷史的、社會脈絡的，與文化層面有關；「誌」(graphy) 則是說明了研究過程中，牽涉書寫與紀錄 (Ellis & Bochner, 2000: 740)，自我民族誌是利用個人經驗去描述或闡釋文化脈絡的書寫實踐，其根源來自於民族誌的研究方法與生命史 (life history)，是一種將自我與他者文化產生連結，將自我置於社會文化背景來考察的研究方式和自我敘事形式 (Reed-Danahay, 1997b: 9)，可以說是一種有意識地實踐自我身

份的建構，自我民族誌同時具有民族誌和自傳的雙重性質，是一種將個人與文化聯繫的自傳式個人敘事，這種個人式敘事對親身經歷進行描述並對個人的文化經歷進行反思辯證。自我民族誌的特點為：(1) 在研究角色上，同時是研究者也是被研究者的雙重身份，透過描述自我的親身經歷來表現自我主體性，表達自我意識；(2) 在研究內容上，自我民族誌主要關注於自身主體性、自我意識和親身經歷，側重於從個體層面上描述研究者自身的看法和實踐，將個人的思想、感覺、故事以及觀察視為理解社會背景的方式，來探究自我與文化背景的互動；(3) 在研究手段上，自我民族誌將自身的經歷、記憶等作為田野文本的分析來源（蔣逸民，2011：11-12）。簡言之，自我民族誌研究的是研究者自身所處的文化脈絡與自身經驗，在爬梳個人的生命經歷的過程中，透過訪談、踏查、翻閱檔案資料等整合方式接續書寫出自我民族誌，除了更貼近自己的根源之外，也將自身的族群背景放在一個更大的社會脈絡中被瞭解，反思個人經驗與文化之間的關係與意義，便是自我民族誌的目的。

二十世紀六〇年代後現代思潮中的「感官轉向」（sensorial turn），人類學者的關注由身體觀轉向到身體感，人文社會學科逐漸擺脫了客觀性限制，學者們對感官體驗、知覺、獲知及實踐探索進行了廣泛討論，反思並逐漸形塑和呈現感官民族誌（sensory ethnography）田野工作的規範路徑。感官民族誌的興起主要受到知覺現象學、空間理論、人文地理學以及實驗民族誌等理論的影響，其依然會使用傳統民族誌方法，如參與觀察、訪談等，但不能視感官民族誌僅是民族誌實踐中的另外一條取徑之一，與傳統民族誌不同的是，它是作為一種批判性的方法，提供新的多重感知方式以及探索和反思知識的生產途徑（Pink，2009：8）。挪用民族誌方法作為研究取徑的當代藝術領域，將民族誌深入結合到創作過程中，以實現一種與地方建立深厚連繫，了解情境化知識的手段（張暉，2016：15），強調的是具身體現（embodiment）與具地體現（emplacement）。具身體現於感官民族誌中意味著透過感官來經驗周遭事物，進而理解地方、他者與自身，換句話說，身體是知覺和理智等精神現象得以產生的媒介，我們通過身體體驗世界，也賦予這種體驗意義。就感官民族誌而言，具地體現則是指研究者將自身放置於田野的地方場域之中，是使感官生產經驗與意義的基礎，透過實地進入田野，我們也得以能夠與地方產生連結。感官民族誌學的思想不僅涉及民族誌學研究和感官詮釋（Pink，2009：11），它探討了感官知覺與文化之間的關係，涉及了視覺型態以及它與其他感官的關係，並反思與質疑在檢驗具身體現感知的位置時，文化如何「被書寫」。

## （二）輪廓、敘事與地方

上述所討論的兩種民族誌研究作為本論文之創作方法，在實務執行的步驟分別為：回顧檔案文獻與搜集田野文本、進行田野調查／執行感官民族誌、資料分析與闡釋、書寫自我民族誌、藝術實踐、反思與檢討。以本論文所執行的創作方法而言，在撰寫敘事文本與執行藝術實踐之前，首先進行了檔案文獻回顧，以我居住的實踐新村為例，我檢視與搜集了相關的歷史文件資料，進一步去劃分出研究範疇，如土地用途、地方建設與



發展、地理範圍等，透過瞭解眷村的歷史並掌握其發展過程，有助於在後續書寫自我民族誌時，能夠更清楚知道自身成長的環境背景；接著我回溯了眷村文學與影視作品，歸納出眷村族群面對離散所建構出精神主體，據以作為創作的核心概念，確立了創作的脈絡基礎與取向。在搜集田野文本方面，其範疇包含了個人日記、書信、照片、家庭故事、對重要人物的訪談等，其中家庭故事與重要人物訪談，我邀請了母親與小叔父分別進行對話式的訪談，在過程中，我瞭解到了更多關於實踐新村的故事與細節，以及釐清重要人物的關係與生平，以「反思與瞭解自我的文化」為核心目標的自我民族誌，在搜集田野文本的過程中，同時也是一種幫助記憶回溯與組織的過程，最終目的是生產反身性的自我敘事，試圖理解自身並引人反思。

進入田野調查與執行感官民族誌階段，感官民族誌著重於透過感官去體驗，與地方產生連結並反思，透過身體記憶的回返，試圖重新找回眷村空間的身體感，據以代入後續創作中的精神概念。根據前置作業所搜集的資料與田野文本，我開始了書寫自我民族誌的工作，在書寫之前，我思考著該從什麼角度切入去探究關於自我認同的命題，我發現父親的卸責與祖父的缺席，對於建構自我影響深切，然而提到父親與祖父，又不得不臆想到關於血統、關於族群的提問。我試圖先梳理清楚我的根源，希冀能夠建構出自我主體，因此在後續的自我民族誌的焦點將關注於我與父親的關係，以及祖父的生平。透過自我民族誌的方法去反思自身於社會中所處的位置，與其產生連結，據此建構出自我認同與主體性，並將上述創作方法所歸結出的脈絡，做為藝術實踐的依歸，透過系列作品，先後將自我認同、精神結構與社會關懷反映並詮釋於作品中，關於藝術實踐的內容、過程與反思將會在第四章說明。

#### 四、藝術實踐：生命經驗的銘刻

在進行藝術實踐前的自我民族誌書寫，其目的不只是單純地描述一則真實的生命故事，而是在書寫的過程中，去發展與確立自己處於社會文化脈絡中的身份與位置，也同時「藉由敘述自己的故事，揭露一個群體正在消失和通常已經消失的生活之道」(Behar, 2010: 26)，身為曾居住過眷村的省三代，我試圖想成為「中介」，以一位局內人的身份去關懷以及替此議題發聲，作為一個見證眷村拆除的「證人」，我所寫下的「證詞」便是最貼近與轉化真實的形式，並據此視為一種藝術實踐。本章節透過夾敘夾議的方式，敘述系列作品的發展脈絡與背景，以及闡明這些作品如何串聯我對於眷村的關懷。

##### (一) 《日日春》

以自我民族誌作為創作實踐的方法，我開始爬梳自己的過去，在這個過程中，只要提及眷村、想起眷村被拆除，若將眷村視為一個父權空間，我發現我不得不回想起父親

的為人處事以及曾經發生的焦點事件如何影響我看待「父親」這個角色、我與父親的關係流變，而在這樣的家庭成長是如何影響我的許多決定：

眼凸嘴闊，皮膚黧黑，頂髮稀落，四肢細如柴，額角的紗布還滲著血，嘴角的紅色汁液不知道是血還是檳榔渣，癱坐在客廳的破舊竹籐椅上，似看非看地望著映像管電視，電視傳來噴笑聲，他仍表情漠然。在工地開混凝土車的他，因為輕率的表現與摸魚成性，與工頭起了口角被痛毆致這副德性，那就是我的父親，我蜷縮在房間門口看著滿是傷痕的他，幾乎快認不得他的模樣。有記憶以來，父親喝酒成性，在床底下、機車車廂、廚房角落有時都能見到紅標米酒的玻璃罐，腹部因酗酒產生腹水而隆起腫脹，祖母與母親百般奉勸他戒酒，也曾為了此事爭吵多次，演變到後來父親的讓步僅是將酒藏起來偷喝。印象中父親在那次被毆之後，再也沒有工作過，成天在房間裡吸著長壽香菸，反覆翻著報紙的求職廣告，卻始終沒有下落，據說很多業主看見他骨瘦如柴、隆起的腹部，一副病懨懨的樣子，第一印象就拒絕他了，後來求職無門則靠著撿拾回收物賣錢來貼補家用。

母親因為父親失能無法工作而肩擔起一家的經濟，原本父親還在工作時，母親在家做家庭代工貼補家用，出去工作後則在一間內衣鋼圈加工廠工作。跟父親的相處時間很長但與他話少，多數時候我獨自伏案寫著功課或是自己玩耍，父親在旁看著電視或是報紙，隻字不語，有時候甚至不知道去哪閒晃了，我們雖是父子卻像是住在同個屋簷下的陌生人。母親受不了他的失職，時常與他衝突，她必須維持經濟來源又必須持家，父親就如同母親的小孩一樣，對於父親我有種莫以名狀、矛盾的感覺，可能近似於鄙視，甚至是同情憐憫，然而因為他是我父親，一方面認為不能對他抱持這樣的眼光，一方面又覺得確實如此，我壓抑起自己的感受，不明白「父親」在家庭中該是什麼樣的角色，繼續與這名為「父親」的陌生人相處。

父親的自尊心極高，即使在扮演父親的角色時有所缺失，他仍拼命地守著一家之主的權勢，以鞏固他在家庭中的地位，小孩只要行事不符合他的意或是沒有順從他，除了會大聲斥責，還會拿出稱為「家規」的一米長的木棍，往我們的皮肉甩去。父親很喜歡唱歌，有次出門玩就帶著全家一起去 KTV 唱歌，大家開開心心地難得一起出來玩，原本一切都還好好的，然而當時行事尚不成熟的大姊，玩味性地將父親正在唱的歌退帶，父親一怒之下使用力地賞了大姊一記耳光，氣氛瞬間凝結，開心的出遊瞬間劃下句點，留下的是驚愕與尷尬，現在回想起來，不確定當時父親會不會後悔這麼做？還是他覺得這樣是正確的教育決策？在我眼裡看來，只不過是為了維護他的自尊心而魯莽做出傷害家人情感的舉動。父親的種種脫序行為與表現，讓我對於他的景仰與期待蒙上了一層陰影，更加模糊不清了，我開始無意識地將他視為反面教材，我不斷地擔心害怕我會成為像他一樣的人，在別人眼中，我究竟是什麼樣的人呢？

民國九十二年，那時候大道新村、實踐新村已經幾乎都拆了，剩下零星散戶包括我們家還不願意搬離。母親知道眷村難逃被拆除的命運，因此很早就開始在看屋，終於在臺南市永康區購置一間法拍的老公寓，便陸陸續續地搬過去，父親由於捨不得從小居住

到大的眷村就這麼消失了，而繼續留守在那邊，直到眷村被拆除為止，父親才搬到公寓與我們同住。

父親的病情每況愈下，肝硬化嚴重，領有重度器官障礙的殘障手冊，住院過幾次後，待在家的時間越來越長，然而他並沒有為此放棄吸菸、嚼檳榔的習慣，在他沒有自覺要愛護自己健康狀況之前，我們怎麼勸說他都沒有用，最後，父親再也離不開床了，腹水擠壓他的胃部導致他吃東西就會吐，甚至吃不下飯，這次，是他最後一次住院了，住院不久他就離開了我們，當年我才高一，在他的病床前悲愴地嚎哭，我不明白為什麼他可以就這麼走了？在離開前，明明臥病在床還依然像孩子似地吵著說要抽菸，如此地不愛惜自己，好似他從一開始就無所牽掛，還是說離開這個世界反而對他是種解脫？他是最親的血脈，然後直到他離開我卻仍對他感到陌生，我還沒有好好的瞭解他，我還想和他度過好長的人生，然而一切都來不及了，留下迷惘的我。如今，父親已逝世九年了，一切的不解、迷惑已無可追問，然而我該如何透過居住眷村的經歷與父親所帶給我的影響，去建構或是提問「我」是什麼樣的人呢？面對父親角色的缺席以及根深蒂固的自卑感，我該如何建構自我認同與個人特質？

如今，父親已逝世九年了，一切的不解、迷惑已無可追問，然而我該如何透過居住眷村的經歷與父親所帶給我的影響，去建構或是提問「我」是什麼樣的人呢？我很感謝父母，雖然是低收入戶家庭，但是他們沒有讓我吃苦，讓我吃飽穿暖還能念書，在成績掛帥的求學環境，我也很努力讀書，考取好成績來申請獎學金，回報他們也減輕他們的負擔，但是我始終擺脫不了這股似乎是渾然天成的自卑感，也許是因為家境的緣故？也許是對於父親的期望落空？因此我只能從學業上來獲得自信，甚至演變成仗勢著成績優異而有些自大，然而在高中以前填鴨式的教育或許還管用，但是上了大學後，不再是選擇題與死背就有好成績的題目，因為還沒適應不同以往的考試方式而碰壁，過去我依存著成績而建立的自信心直落谷底，甚至對當時的我來說成績就是建立我這個人的價值所在，我從一開始抗拒否認，到試圖改變，後來自暴自棄，最後還是接受事實，希求能重新建立起自信，我開始想著從小到大我似乎都是為了滿足期望而念書，從國中升高中開始，原本對於職校的廣告設計科有興趣，但是想到家裡可能無法負擔職業取向的教材費用，再加上當時社會仍是高中比較具有發展性的迷思，因此作罷轉而就讀普通高中，高中畢業後，終於要決定未來的發展方向，我曾一度考慮要為了家裡報考軍校，但終究無法妥協而打消這個念頭，後來決定就讀公共行政相關科系，算是最後的協商結果，仍是想像著未來能夠考取相對穩定的公職，我發現我從來沒有想過自己想要什麼樣的人生，於是在大三的時候，我因為加入了社團、系學會，發現了我的興趣與專長是視覺傳達領域，為了製作系學會活動的主視覺海報，我可以不眠不休直到滿意為止；為了剪輯課堂的作業影片，我也可以忘記吃飯喝水，我當時覺得我好像可以重新找回自信心了，原本畢業後若是沒有特別打算的話，大概就是考公職，但是我不甘接下來的人生日復一日做著沒有熱忱的事渡過，於是我決定報考研究所，希望能夠真正開始掌握自己的人生，為了自己而做決定，我一邊打工、一邊補習，同時兼顧學校的課業，終於在我的努力之下，如願以償地考上我心目中的研



究所，然而當我以為我開始能夠重拾自信的時候，卻發現事實也許不如想像中的那樣，面對父親角色的缺席以及根深蒂固的自卑感，我該如何建構自我認同與個人特質？

透過自我書寫的方式去爬梳童年時期的創傷以及生長環境，發現在建構自我認同的過程中，所遭遇到的建構個人主體性的困境，似如拉岡論述鏡像理論階段與詮釋伊底帕斯情結時，所指出雙親的角色影響個人的人格建構。鏡像理論階段是個人建構主體最原初的一個階段，幼兒確立了自己是與母體分離的個體，而母子的親密關係，讓幼兒把自己當成了是母親的慾望對象，只有自己可以滿足母親的匱乏，這是伊底帕斯情結的產生，然而父親角色的出現，剝奪了幼兒成為滿足母親匱乏的對象的身分，對幼兒而言，以一個阻擾者的身分介入，在父親的「法規宣告」以及幼兒的「閹割恐懼」之下，幼兒服膺於父親的法規，伊底帕斯情結逐漸消退，在這階段中，幼兒自覺的意識到：母親的慾望只有在父親法規的象徵意義當中才能找到真正的滿足，而父親角色成為「象徵性的父親」和「父親的名字」具有了至高無上的制衡性作用，此時父親成為兒童的榜樣，父親不再是他的競爭對手，而是幼兒學習、模仿和認同的對象，幼兒透過父親而確認了自己獨立的主體性人格。<sup>1</sup>

透過拉岡對於個人主體建構的理論，我不斷地思考著這是否就是使我建構自我認同時，遭遇到困難的原因？是否能夠透過藝術創作來召喚回那段缺失進而修復關係？據此，我嘗試以藝術實踐去回應這個命題，以個人與家族影像作為物質材料，藉由百納被的形式去生產家族敘事，重拾過去經歷的缺失來重新經驗鏡像階段。

我嘗試以藝術實踐去回應這個命題，我利用個人與家族影像做為材料，透過「百納被」的形式去生產家族敘事，重拾過去經歷的缺失來重新經驗鏡像階段。在表現形式上，我利用家族與個人的影像去拼貼、堆疊，並將破碎的影像錯置，利用蒙太奇手法建構出自己的成長背景與經歷，也暗喻著回憶的不連續性；我將自己求學每個階段的肖像依序排列，思考不同時期的模樣具有的同性能否也建構出自我認同的同性能否？在百納被的中心，放置了幼稚園時期的肖像，在其上覆蓋著印製著我父親照片的薄紗，我思考、隱喻的是我們無法揚棄血緣關係的事實，每個人一定都會受到原生家庭的影響，建構出接觸這個世界的方式，我們該如何在這樣的既定事實下，重新檢視自己、建構出自己的生命樣態，清楚瞭解自己的過往，不代表就因此籠罩在過去的陰影，而是接受它並視為生命的一部分。我思忖著如何讓觀者不只是以他者的角度去觀看一個生命史，我希望透過作品，讓觀者能夠得以反思自身經歷並產生自己的敘事，展開與自己的對談，因此在展覽呈現上著墨，希望將作品的意涵傳達出去，我並沒有採用傳統百納被的展示方式——如畫一般懸掛於牆面，而是將它的四個角懸掛於天花板上，布料的垂墜特性，在百納被下方形成一個儀式空間，觀者需要透過仰望的方式去欣賞作品，帶入身體感的觀看方式，

<sup>1</sup> 改寫自王國芳、郭本禹，《拉岡》（臺北市：生智，1997年），頁129-161。

讓作品不再是停留在單向傳輸，而是雙向的交流。

## （二）《一九二一湖北宜都·一九四九臺南練兵場》

重新建構個人主體性的過程中，我發現遺憾的是我從來沒有接觸過我的祖父，他在民國八十一年過世，我在民國八十四年出生，我卻從來不曾聽過家人們提到關於祖父的往事，好似離去的人再也不被記得一樣，而他生前對於被迫離鄉的怨嘆、不知何處為鄉的迷惘該如何安放？我開始好奇祖父是什麼樣的為人，他身為省一代，在來到臺灣前過著什麼樣的人生、有著什麼樣的經歷？祖父的缺席，讓我無從想像祖孫之間的感情將會是如何，也不禁讓我思考著，若是祖父還在，會不會一切狀況都不一樣，眷村是不是就不會那麼快就拆除？對於來不及參與彼此的人生，我感到非常惋惜，冀求能透過瞭解他的過往試圖找回那段缺失，也嘗試理解經歷過離散的處境，如何在臺灣安身立命，於是我開始探問祖父的身世，我訪談了小叔父，請他訴說祖父的故事：

民國二十六年，日軍入侵中國，國民政府軍力嚴重不足，在路邊隨機押人加入軍隊，若不服從便直接用刺刀戳死，若是逃跑的話則直接槍斃，祖父之所以當兵，是一次他到其他城市遊玩，途中遇到國民政府軍隊因此被強押從軍，當年他才十五歲，槍桿加刺刀放在地上都比他的個頭還高，連槍都還沒拿過就要跳入戰場廝殺，當他即將從軍前軍隊要他回家跟父母拜別，自那次拜別後，他再也沒有回家。祖父的祖籍為湖北省宜都市，當時由於中國傳統早婚為常態，他還有一位懷有身孕的妻子，然而因為戰爭，他無可奈何地離開家鄉，開始了他的軍旅生涯。

在他的打仗時，曾經有次差點丟掉小命，那是在對抗日軍的時候，祖父那時已升為班長，帶著一班兵駐紮守衛，他的屬下班兵私底下玩推牌九<sup>2</sup>被營長發現，然敵前作戰賭博視同死刑，正當即將行刑，一位班兵站起來說：「報告營長，我們去攻那個山頭（日本人所在的碉堡），攻不下來我們就死在那邊，攻下來能不能將功贖罪？」然後營長答應他們的承諾，然而在山頭上等著他們的是一個連的日本軍，祖父知道一班的武力是敵不過一連的，與其鬥力，不如鬥智，於是祖父就扛了一挺機槍上去，那時候武器不多，有一挺機槍的班兵已經算武力很強了，他攻進碉堡之後，找三個入口，拿著機槍跑到第一個入口打，再跑去第二個打，再跑去第三個打，讓日軍誤以為三個入口都有敵人，於是整個連的日軍就這麼逃跑了，當祖父帶著整班的兵回來的時候，營長只好鼻子摸了，就讓他們將功贖罪了，也因此逃過一劫。

民國三十八年，國民政府戰敗，祖父跟隨軍隊撤退來臺，那時他已經三十歲了，整個青春歲月都在軍旅中度過，由於不是正規軍，僅以行政官的身分在軍中服務，靠著微薄的軍餉維生。時間來到民國七十六年開放兩岸探親，然而祖父並不打算回去，原因是

---

<sup>2</sup> 推牌九，是中國傳統骨牌遊戲，玩法是依據兩扇骨牌點數的不同組合，來比較大小，以決定勝負。

親人都因為戰亂不是死亡就是失去聯繫，就算回去又是為了誰？故鄉不再是當初的模樣，即使當初不是出於自願來到臺灣，然而臺灣也許已成為他心目中的家鄉。

在參與交大應藝所林欣怡教授的所開設「雙城·聲繡」工作坊的過程中，我重新去思考與揣摩祖父當時面對流離的處遇與心態，我想透過藝術實踐的方式，將祖父的生命故事以批判性的角度，除了意圖去控訴政治局勢下的不公，也想透過個體的敘事去闡明外省族群的相同遭遇，去回應更大的社會議題。實踐於藝術創作中，我思考著如何以視覺物件呈現異地離散，臺灣與中國，兩個被稱為「家鄉」的地方如何進行對話與交流？而聲響作為一種敘事方式，如何將流離的故事透過不同的感官使觀者感知而呈現出來？視覺物件方面，我嘗試了不同方法後，最終使用藍曬的技法，將肖像成相印製於棉布上，我使用負像的方式使其成相呈現，我認為負像能夠暗喻影像中的人物已不存在於我們的世界，透過負像意圖呈現與靈體對話的過程。在其上我將家族合影與肖像再次複印於描圖紙上，並將其邊緣撕碎成塊面形狀，使其產生類似島嶼的形狀，透過這樣的方式，我試圖傳達在他們心目中已畸零的家鄉想像，復返在漂流的塊面空間。



圖 4.1 《一九二一湖北宜都·一九四九臺南練兵場》互動方式

### （三）《被拋售的寄生》

回到實踐新村舊址，緩步在過去眷村的位置範圍，走在這個場域，細細感受眷村被拆除後的遺跡，當眷村空間被瓦解、眷村居民被遣散，持續存有的是地方的殘餘，這些殘餘是物質性的，也是精神性的。眷村被拆除後，房舍的原始樣態已蕩然無存，留下的是殘磚破瓦與雜草叢生的荒蕪景象，使否指向著基於政治局勢下壓迫的物質性消滅，所留下的眷村殘餘。

在物質性以外，眷村作為社會建構的地方展現了歷史的意義，在相對封閉且具有排他性的眷村空間建構了獨特的文化脈絡，由於國防部統一集中建設管理，讓全臺各地的眷村有著一定同質性，但每個眷村內部卻因為軍階、祖籍、經歷的不同而仍保留著其異質性，眷村作為一個「集合空間」，它把具有相同歷史背景，同樣具有逃難經驗，也可能背負著類似的戰爭傷痛、家園毀敗的人，聚集在一起。然而本質上，他們的故鄉地緣、生活習慣、文化習俗，都是截然不同的。（陳國偉，2007：255）我思考著如何從一個眷村家庭出發，透過藝術介入的方式去回應更大的外省社群？由於過去居住於眷村的經歷影響很深，以至於我在創作的初始就一直從當事人與他者之間的身分來回切換辯證，也許是身分上的特殊性，期待能夠透過不同的視角去看待眷村的精神結構與社會建構，以感官民族誌作為藝術實踐的方法，產生新的敘事方式。

《被拋售的寄生》這件創作來自兩個概念：流亡的國黨在戰敗後撤退到臺灣，藉著軍權殖民於臺灣，透過戒嚴肅清異議份子，維護其統治的正當性，以一種侵略性的姿態強硬地「寄生」於此，臺灣不但沒有被「光復」，反而在既得利益者的壓迫下一起沉淪；第二個概念來自居住於眷村的基層居民，他們因年老多病而無法謀生也無處遷居，可能只能依靠微薄的榮民津貼苟延殘喘，他們甚至沒有子嗣，也許只能無親無故地孤老終生，面對政府眷村改建的法令，他們無所適從，也沒有受到該有的安置，即使有受到賠償而難保餘生，無奈他們竟被政府視為「寄生物」般強硬的剷除。前述兩種狀態的外省族群，同樣來自中國，來到臺灣卻遭遇截然不同的命運，差別或許只在於掌權與否，同樣的是，他們似乎都是「寄生」於這片土地上。

在既有的形式上，我透過感官民族誌的實踐，想著如何消弭視覺霸權的缺失，如何體現多感官統一性（multisensoriality）？聲景（soundscape）做為了解世界的一種途徑，也提供批判性思考的途徑，讓觀者經驗一個作品時不再只是單向溝通，而是開啟新的對話方式，也使得一件作品產生不一樣的經驗方式。在作品中，我想著如何透過聲響去建構地景，如何透過聲響生產眷村的意向性？如何在經驗聲響後，開啟批判性的思維？技術上，我使用 Touch Board 連結每一個物件，使其在觸碰時發出聲響，透過觸碰即發出聲響的過程中產生共感，複合聲響結合身體感的實踐，試圖讓觀者具身體現地細細查閱地方肌理；在聲響上，每一個物件發出的聲響各不相同，有些是無機的機械聲響、有些是於眷村舊址錄製的環境聲響、有的則是節錄自訪談的敘事，我試圖透過這些聲響來建構眷村地方的聲景，也同時指涉國家機器的壓迫與展現犧牲者的無奈。



圖 4.2 《被拋售的寄生》物件

#### (四) 小結

就文化研究的觀點而言，本論文嘗試援引並實踐自我民族誌作為研究方法，以自己的生活經驗作為研究範疇，書寫個人歷史，在此過程中，是一種不斷地辯證反思自我認同的建構與身份位置的確立。身為眷村族群的一員，透過自我銘刻來見證這一段淹沒於洪流的歷史，得以使個體去連結更大的社會社群，試圖在文化脈絡中建立主體性，回應自我與族群的關係鏈結。透過反覆解構與組構童年居住於眷村的經驗，我思考著其對於自我身份認同的建構所具的意義，是一種將零碎的回憶聚合起來以瞭解當前的處境與確認自身的過程。從上個世代開始，眷村族群從原本位居主流文化的地位，隨著政治、經濟環境與意識形態的改變而逐漸被邊緣化，反映了此族群在社會結構與層級的流變。眷村空間的退場造成本省與外省的界線消退，以及中華民族主義思想教育的削弱。反身性地自我爬梳後，我關注的是朝向自我與眷村的相互主體性，以及自我與外在社會的關係轉變，我致力於眷村與社會的權力結構的闡釋，透過視、聽、觸覺的多重建構，將身體置入於眷村空間，將被壓迫的身體感透過複合媒材的表徵，透過感官的建構與藝術實踐，企圖以眷村族群的身份與更大的外在社會開展對話。

### 五、反思與結論

眷村的形成，反映出其獨特的政治與歷史背景，所發展的文化意涵不僅是城市紋理的，也是精神結構的。梳理了眷村的文化脈絡與自身的連結經驗，開展對於眷村相關社會現象的提問，並意圖透過藝術實踐的方式去回應關於眷村族群對於身份與國家認同的矛盾，以及眷村改建政策下的爭議，最終回到自身，反身性地思考自我認同以及隨之產生的關聯與意義。外省族群所面臨的認同危機不在於他們的血統、口音、祖籍，各方面與臺灣本土格格不入，而在於他們認同什麼樣的國家，而他們所認同的中國，似乎僅存

在於過去與想像之中，他們就此自我定位，認為總有一天會回歸祖國，然而外省族群的大半人生都在臺灣渡過，精神上的家鄉在中國，實際上的家鄉在臺灣，因此產生了國家認同上的矛盾。

在臺灣，由於居住的隔閡，所以省外族群被視為是一個單一的族群，而被台灣的本省人區隔開來，所以他們在台灣是被當作大陸人（陳國偉，2007：269），眷村的排他性，使得眷村族群無法融入臺灣本土社會，他們無法甩開省籍標籤，以如同受害者的姿態高喊：「不是不認同，而是不被認同。」闡釋了眷村族群面臨認同困境的無奈。隨著解嚴後興起的本土化意識，以及眷改條例頒布以來，眷村陸陸續續拆除，打破了一直以來存在於本省與外省之間的疆域，當眷村族群匯入了社會洪流中，省籍標籤也漸漸地隨著時間剝離。身為居住過眷村的省三代，隨著時間推移，在政策與社會朝向本土化的今日，體認到「認同不再是國家由上而下的灌輸，而是由下而上的個人的選擇總和」（Ibid：9-10）。關於自我身份認同的提問，我根據自我民族誌所生產文本反映於作品《日日春》中，藉由百納被的家族相片拼貼作為一種敘事方式，利用影像中的視覺符號去揭示自己的出身背景與血統，透過影像的重複堆疊指涉著自我的同一性；不同時期的破碎肖像則暗示了一點一滴的自我建構過程，我想藉由這件作品說明的是，我們不可否認血緣關係，然而我們將建構出什麼樣的生命樣態與認同，取決於自己，我認同於自己來自眷村並擁有中國血統的身份，然生於斯長於斯，我認同自己是一位臺灣人，便是我一直追尋的答案。

在《日日春》這件作品中，我透過作品去回應了自我的身份認同，在過程中，我也聽了很多關於祖父的故事，似乎讓我與他更親近了些，促使我開展了對於祖父的想像，我好奇他曾經歷過戰火、面臨離散的心境轉折並試圖去理解，會是隨遇而安，還是埋怨且憤恨不平？我利用作品《一九二一湖北宜都·一九四九臺南練兵場》去回應這個命題，透過祖父的生命故事的詮釋，意圖去引發更多關於離散的反思。

在作品《被拋售的寄生》中，「寄生」本身並無貶義，而是我企圖透過這個概念除了去闡釋眷村族群的「不認同」與「不被認同」，他們終其一生陷落於國族與身份認同的泥淖裡，生活於此卻始終無法認同這片土地，寄望著總有一天能夠回歸祖國，再加上刻板的省籍標籤使他們無法融入也不被接受於本土社會，猶如寄生於這片土地，在如此的脈絡下，他們即使「客死異鄉」，也仍然將臺灣視為過渡的寄居之地，一輩子漂浮而無法落地。

距離實踐新村拆除至今已逾十五年了，關於眷村的故事早已隨著亡者的逝去而飄零、隨著後代們的被迫離開而消散，曾經居住的眷村已塵埃落定，從熟悉的地方化作陌生的地景，不再是當初記憶中的面貌，眷村子弟們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從離開眷村以來，我試圖去思考為何我執著於自己出身眷村的背景與居住經驗，然而卻一直任其懸置而不去觸碰與釐清，直到這幾年來，在因緣際會下，我開展了對自己的提問與對話，透過一連串的檔案回顧、田野調查、對話訪談等工作，並就其建構出的脈絡進行藝術實踐，經由反思，除了試圖去追尋屬於自己的身份與族群認同之外，也透過自我與社會連結去關



懷面臨認同矛盾的外省族群與眷村改建政策下沒有被妥善安置的基層居民，意圖開展更多關於眷村的思考與對話空間。

我透過爬梳自己眷村背景的成長經歷、回溯文學與影視作品，以及進行田野調查、對話訪談與感官民族誌的實踐，藉由這些工作的成果去整理歸納出對於眷村族群的問題意識，以及他們在面臨離散所形塑的精神結構，做為後續藝術實踐的核心概念。確立創作脈絡後，在藝術實踐上，我思考著如何透過物質性象徵的呈現與詮釋，去講述關於自我與身份認同的命題，我透過符號與影像去召喚屬於那個年代的歷史，試圖藉由背景的建構，去帶出關於眷村族群精神結構的議題。在創作的過程中，我不斷思考著我以「見證者」的身份，如何具有足夠的話語權去替眷村族群發聲，我並不意圖去標誌出「我群」與「他群」之分，而繼續深化族群的隔閡，在臺灣本土化的今日，族群的融合已成了事實，我透過藝術實踐所冀求的是一種揭露社會現象的行動以及相互理解的展現。

## 參考文獻

### 中文

#### 一般書籍

- 王國芳、郭本禹（1997）。拉岡。臺北市：生智。
- 朱天心（1988）。想我眷村的兄弟們。臺北市：麥田。
- 朱天心（1990）。方舟上的日子：臺灣眷村文學。臺北市：三三書坊。
- 高格孚（2004）。風和日暖——外省人與國家認同轉變。臺北市：允晨文化。
- 袁瓊瓊（2015）。滄桑備忘錄。臺北市：九歌。
- 張啟疆（1996）。消失的□□。臺北市：九歌。
- 陳國偉（2007）。邊緣化焦慮與精神流亡：省外族群書寫的空間化呈示。載於國立編譯館主編，想像臺灣：當代小說中的族群書寫（頁 245-334）。臺北市：五南。
- 楊佳嫻（2013）。方舟上的日子——台灣眷村文學。臺南市：臺灣文學館。
- 齊邦媛、王德威（2004）。最後的黃埔：老兵與離散的故事。臺北市：麥田。
- 蘇偉貞（2004）。臺灣眷村小說選。臺北市：二魚文化出版。
- Behar, R. (2010)。傷心人類學：易受傷的觀察者。黃珮玲、黃恩霖譯。臺北市：群學。
- Cresswell, T. (2006) 地方：記憶、想像與認同。徐苔玲，王志弘譯。臺北市：群學。
- Gray, A. (2008) 文化研究：民族誌方法與生活文化。許夢芸譯。臺北縣永和市：韋伯文化國際。
- Kalra, V. S., Kaur, R., Hutnyk, J. (2008) 離散與混雜。陳以新譯。臺北縣永和市：韋伯文化。

### 中文期刊

- 張暉（2016）。視覺人類學的“感官轉向”與當代藝術的民族誌路徑。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8，11-16。



楊爽、鍾志勇（2014）。自傳式民族誌：概念、實施與特點。廣西民族研究，5，58-63。

蔣逸民（2011）。自我民族誌：質性研究方法的新探索。浙江社會科學，4，11-18。

#### 學位論文

張安捷（2008）。末代臺灣國軍老舊眷村改建觀察：以拍攝紀錄片「沙舟」為例。國立臺南藝術大學，臺南。

黃于禎（2011）。府城（台南）北門城外的歷史變遷。國立臺南大學，臺南。

#### 視聽媒體資料

林登飛（監製）、王童（導演）（1989）。香蕉天堂【DVD 影片】。臺北市：三一股份有限公司。

胡台麗（監製）、胡台麗（導演）（2005）。石頭夢【DVD 影片】。臺北市：同喜文化出版工作室。

許新枝（監製）、侯孝賢（導演）（1985）。童年往事【DVD 影片】。臺北市：中央電影公司。

專業者都市改革組織（監製）、黃孫權（導演）（1997）。我們家在康樂里【DVD 影片】。臺北市：獨立媒體有限公司。

#### 網路訊息

殷寶寧（2017年10月24日）：文化觀察》「吃」光記憶嗎？從跨國移動、全球餐桌談食物與鄉愁的記憶【Openbook 閱讀誌】。取自  
<https://www.openbook.org.tw/article/p-812>

蔣曉雲（2010年07月16日）：都是因為王偉忠【聯合報】。取自  
<http://city.udn.com/51040/4058700>

#### 英文

## 一般書籍

Atkinson, P. (1990). *The Ethnographic Imagination: Text Constructions of Reality*. London: Routledge.

Cresswell, T. (2004). *Place: A Short Introduction*. Malden, MA: Blackwell Pub.

Ellis, C. & Bochner, A. P. (2000). Autoethnography, Personal Narrative, Reflexivity: Researcher as Subject. In N. Denzin & Y. Lincoln (Eds.),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research* (pp. 733-768). Thousand Oaks, CA: Sage.

Pink, S. (2009). Situating Sensory Ethnography: From Academia to Intervention. In Sarah Pink, *Doing Sensory Ethnography* (pp. 7-23). London: Sage.

Reed-Danahay, D. (1997) *Auto-ethnography: Rewriting the Self and the Social*. Oxford, UK: Berg.

## 期刊

Conquergood, D. (1991). Rethinking ethnography: Towards a critical cultural politics. *Communication Monographs*. 58(2), 179-194.

Drever, J. L. (2002). Soundscape composition: the convergence of ethnography and acousmatic music. *Organised Sound*. 7(1), 21-27.